

忧患意识与诗意表达

——读纪实文学《粮道》

□王 晖

任林举的长篇纪实文学《粮道》，无疑是一篇有着独特气质的非虚构作品，其表达方式令我想起秦牧的散文《土地》。以“土地”为核心意象作上天人地、谈古论今式的言说，使秦牧作品独具知性和感性，在上世纪60年代散文中可谓独出机杼。在《粮道》里，我似乎又看到了在“粮食”为核心意象的叙述中进行秦牧式发散思考的影子。这完全可说是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等问题做出形象化的解读。在纵横交错之间，表现出作者对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深切关注，充满着理性精神、忧患意识和批判思维。我很认同赵致对《粮道》文体的判断：“如果你仅仅注意到了纪实性，或许你将错过一本优秀的文学读本；如果你仅仅停留于文学的欣赏，或许你将错过深刻的哲理；如果你仅仅拘泥于某种哲理的体悟，你或许又将错过一位作家最宝贵的忧情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粮道》是一个“新概念”纪实文学。它对于“粮食”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关注，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问题报告文学，但它的叙述却更为从容——由粮食说开去，在多学科

视角的观照下，以生动的话语阐述“民以食为天”的“大道”，以及粮道与人道、粮道与国家、粮道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作者在文中多有大胆思考，譬如：“粮食是自然的精灵，所以粮道永远高于人道，高于官道，高于世道。一个社会或一个时期，认可、倡导、倡导的官道、世道与粮道相适应时，那么这个社会或时期一定是和谐、昌盛的，反之则是凶险和衰弱的。”这些思考和发声某种意义上确认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旨归，而这对于一部非虚构作品，尤其是关注重大问题的非虚构作品而言，是怎么强调都不为分的。

既关注粮食和粮食生产的历史，更注重这一问题的当下性，因此，我们不能不肯定这部作品强烈的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的传达则遵循着非虚构文体的叙述原则——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进行佐证，也没有忘记反思与批判的书写态度。作品对于前者的呈现可谓比比皆是，这里有作者亲自采访四叔、三子、二娇、徐二喜、胖子、吴志军等农民的现场描述，也有对于历史文献和现实数据的详尽铺陈，真正体现出“用事实说话”的文体特质。与此同时，作者并非以纯粹新闻方式表现这些具有现实感的人、事、理，而是有着自己观照事物的倾向性，这就是浓郁的忧患意识和哲理式反思。

作品的非线性结构不仅最大限度地凸显了这样一种意识和反思，也为作者的发散性思维创造了绝佳的叙述境界。全篇八章始终贯穿着作者的忧患与反思：譬如关于“粮道”的领悟及其规律的把握；关于人类“上帝怀里的解药”那样依赖粮食，从而暴露出生命的脆弱；关于种粮人的苦命、弱势，代人类受自然的各式各样的惩罚；关于“粒食者”与“肉食者”之间自古而今的文明博弈和文化冲突；关于转基因粮食的义与利，是与非；关于粮食与社会、世道变迁的复杂关系；关于粮食领域的“生物海盗”及其潜藏的危险；关于粮食领域的“鸦片战争”。应该讲，这些凝聚着作者个人思考与智慧的忧患与反思，是具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它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于非虚构文体特性的领悟，以及对于“思想者”在非虚构写作中所占份额重要性的认知。

与强烈的忧患与反思相对应的是，作者还十分善于或者说非常乐于以“粮食”为核心意象的诗意表达。这里的“诗意表达”其实是作者内心对“粮道”爱意的表现，正所谓爱之切，忧之深。当然，作为非虚构文本，完全应该区别于而不是混同于历史著作、调查报告、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因为它理所当然地不可或缺艺术性，不若此，它的存在就无必要了。我在《粮道》里欣慰

地看到作者艺术表现的才能，他所具有的叙述功力和情感抒发力，特别是他融广博知识与一文的统摄力，都令人难以忘怀。就像余光中的诗常常凸显的是因海峡之阻隔而郁积成挥之不去的“乡愁”，任林举在文中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表达对于故乡和田园的眷念，而这种眷念始终是充满“乡愁”一般的诗意情感——“总是那不着一砖一瓦的土平房，总是那被雨水冲刷得露出泥土波纹的院落，总是柴门，总是起起伏伏的板障，总是牵牛花和豆角秧，总是一碗小米干饭和大葱、大酱……凭空地，空气里就会飘动着一一种令人心动的味道，宁静、灵动并有断续的香甜，近似于花香，又近似于新翻起泥土的芬芳。”这样的诗意表达与作者的忧患一样贯穿作品始终，并且是以诗意表达来映衬忧患与反思。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第三章“凌晨三点的声音——粮食与命运”、第四章“知雄守雌的‘粒食’——粮食与文化”、第五章“别管我叫爸爸——粮食与伦理”等章节，更为集中地把握这一特点。因此，尽管《粮道》所涉及的话题是宏大的、沉重的，但仍然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而这部作品可读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便与诗意表达相关。这使我想起任林举的另一部长篇作品《玉米大地》的文字风格，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只是《玉米大地》更重感性和抒情。相比之下，我以为《粮道》更为成熟一些，无论是内涵还是表达，它给予我的冲击力、启示力和感染力都更为强劲。所以，我满心期待作者的下一部，期待他为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增添更多的智慧、锐气和力度。

浩舸原名张克利，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工作，酷爱诗歌创作，取得了不小成绩，曾出版《浩舸诗词选》《大地苍茫》两部诗集，引起李肇星、王蒙、贾平凹、雷抒雁、赵丽宏、贺绍俊等诗界耆老们的重视与评介。《一枝梧叶知秋声》诗意表达了诗人对当下世界、家园、企业、个体、人性等方面的人文关怀和思考，有不少还站在企业角度表达了对中外经贸友好往来以及长期在外工作同志战友生产生活的关切，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回望和致敬。虽然尽是诗人年届“知天命”时期的作品，但《一枝梧叶知秋声》却全然不见“秋天漠漠向昏黑”的哀伤，更没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的孤独，“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肃杀，代之“凄凄惨惨戚戚”的秋雨、秋霜、秋寒、秋叶等悲情形象的是其思想的成熟、情感的丰沛、生命的灿烂、艺术的光华，令人感动于秋日的风清气正、秋空的天高云淡、秋色“的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秋景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真正感受到诗人“描绘这大时代的变化，记录下点滴发生的国家大事、世间人情、人生态度、喜怒哀乐、传播一份有责任、有情怀的正能量”的美学力量。它们“言之有物、言之有意”，是足以“感动自己、影响别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后记》)的诗意书写。

《一枝梧叶知秋声》，收不胜收那由“风声雨声读书声”交响的壮美“秋声”、由“国事家事天下事”锦织的人间情怀：《定风波·中国经济新路》《路莎行·远航》《七古·扬帆远航》《品读经济学》等展示了诗人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掌门人的政治高度、民族责任、社会承担；《浣溪沙·神十向天》《春韵》《江城子·同行》《一曲新歌天际飘》《天净沙·抗洪》《赞比亚》等颂扬的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可喜进步、抗震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辉煌成就。最令人动容的是《忆秦娥·加入作协感怀》，它生动表达了诗人收到中国作协发来的入会通知后的难平心绪：“历艰辛，少时梦想成真。今成真，登堂欢欣，天道酬勤”，一派由衷的喜悦溢于言表。与之相呼应，我们从《七律·黎明时分》《学书》《读书》等作品中可以照见作者勤奋学习的身影、探求知识真理的心志、酷爱文学艺术的秉赋。除外，《心境》《弄潮》《鹤鸣天·叮嘱》亦酣畅“言志”、“明心”，表现了诗人“千折万转莫回头”、“挺立潮头弄春秋”的浩然正气、坚强意志，以及敢攀险峰小众山的大智大勇。一如所有成功人士，诗人人性光芒、追求高雅、情感丰沛，他珍视友谊、崇尚忠诚、充满亲情、坚持正义、捍卫尊严，以《真情》《弄潮》《江城子·小记》《水调歌头·寻觅》等作人间正道的正确引领，却令那些背叛、无情、奸佞、虚伪、贪腐、残害忠良者五雷轰顶。在我看来，《南歌子·憩园晨景》《泛舟》《五律·春游记》《风入松梦》等继承了中国诗歌中审美大好河山、怡情天人合一、表现生命美好与生活乐趣的传统；而《江城子·江风愁》《七绝·京城天气》《雨后晨韵》等则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生态问题作了深度开拓，对“惟GDP论”政绩观影响下产生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进行了猛烈抨击，可谓爱得深从而也就恨得切。它们所呼唤的是青山绿水常在，所期盼的是精神家园永驻，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普世意义；却看《无题》《钗头凤·踽踽学步》《新绿》等作品，尽述种种人生感悟，“天下万般事，皆随因果生”，“理智可以释恩仇，宽容色彩自斑斓”等句予启发人们的是凡事都要遵从自然法则与社会规律，坚持实践论，坚定理想与信仰，保持品格与气节，从而进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化境，多了一些人生的澹定从容、超凡脱俗。总之，在浩舸的笔下，秋声是美丽的、浑厚的、嘹亮的，它唱出了高远、清明、激越的人间正气、诗歌新声，以致空谷传响、羚羊挂角。

《一枝梧叶知秋声》在艺术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正确处理了思想与艺术、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它在语言的准确运用、各种修辞手段的熟练驾驭等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在诗歌格律上用力苦深，独推出“新古体诗”概念，较成功地解决了“师古”而不“泥古”，“创新”但“固本”等难题，实现了让自己的诗作“成为一曲心灵之声的律动，成为一盏彻照人性光辉的明灯”(《我的新古体诗情怀》)的初衷。关于“新古体诗”，它是诗人受诗界前辈贺敬之的启发而提出的新概念。尽管尚未对其内涵、外延作精确的界定与系统的阐述，但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诗人的基本理念：它属于诗歌体式问题；为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内容、情感、意象与意境、语言美、节奏感而独创的诗歌形式；以古体诗为“正格”，基本恪守有关字数、句式、押韵、结构、节奏等规范，却突破一些对仗、用典、平仄、韵律上的限制，以找到一条酣畅淋漓“言志”、“咏物”、“感怀”、“抒情”、表达“诗意”的康庄大道。

据我有限的知识，浩舸的探索积极稳健，中国诗歌的形式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不断成熟的形制，从无定于一尊的陈规。关键在于中国诗歌应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表现中国人民，反映时代风云，并且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讴歌真善美，激扬风骨，让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是颠覆传统、盲目引进、胡乱“创新”。依我品读，《一枝梧叶知秋声》情丰采丽、华美正足、语言典雅、意境深远，是对中国诗歌精神的正本清源，也是对那些诗歌本性流失的非诗、伪诗的反动。它直面正在不断变革、不断追寻中国梦的社会现实，捕捉了健康的诗意，喷发了壮美的诗情，引领着新诗发展的方向，对旧体诗与新诗的交流、对民间诗歌与文人诗歌的贯通、对中外诗歌的对话乃至对接都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无疑，这对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具有中华精神和中国气派，又有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的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意义都十分重大。

向往自由的爱情。她在中式建筑里享受着西式壁炉、咖啡、品读希普金抒情诗的西式文明，她投资办学、兴办电力公司，为使饥民能耕者有其地而疏浚河道、兴办农场。夏天敏把特殊年代和典型地理环境中富于边地特色的历史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融入主人公云霓身上，独特的边城文化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存、互相渗透”，云霓成为古老封闭而又现代开放的极地边城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在矛盾中徘徊的家族叙事

这是一部有特色的家族史诗叙事小说。家族史诗一直是现当代作家所迷恋的一个叙事母题，现当代家族叙事既有历时性的动态发展，又有共时性的静态模式。对现代以来的作家而言，家族是情感的家园。

这部作品承袭了作家那种来自大地的“现实感”，很多针对政治、生活、人物、风俗人情的议论自然地镶嵌于叙述与对话之中，显示出作家在《好大一队羊》中就彰显出来的可贵的“关注现实”的创作立场。在批判边城迎来送往根深蒂固的同时，赞扬了教会医院来自英国的玛丽·朱丽叶和留法植物学专家胡镜远对事业的孜孜以求，在批判与赞扬中寻找中外差距产生的根源，将家族的兴衰和民族的劣根性表现得一览无余。

但是，也恰恰因为作家的“现实感”太强，使得家族史诗叙事的“寓言”功能被削弱，寓言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它具有言外之意，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相互指涉，形成独特的叙事话语系统，通常具有讽刺和劝喻的功能，它以文本内叙事关系喻指文本外的叙事关系，因此便在表层文本与深层文本间建立了丰富的联系。夏天敏的这部小说缺乏时间积淀产生的“距离”感，无法让核心意象自然地建构更有穿透力的寓言叙事，使得思想的承载略显单薄和苍白。他的中篇小说《好大一队羊》《随水而去》等作品，时常让我们感受到残酷的现实境遇对底层百姓强力挤压而产生的钻心的疼痛。《极地边城》始终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犹疑、徘徊。写历史，积淀不够；写现实，缺乏应有的疼痛感。

从断裂抵达圆融

——《隐》的策略及诗意分析

□潘桂林

杨林诗作善用思辨和解构之光透视表象，撕裂蒙着幻梦的现象之美，抖开世界近乎残酷的真实，凸显生活表象与内质的断裂，但他没有顺着断裂的豁口沉沦，而是在新的层面上回归圆融。诗集《有缝对接》的命名可以理解为存在与虚无的圆融对接。短诗《隐》体现出密集的象征意象剪组合错位：风看清“鸣咽”；弯曲，说得密合；事物因阴影而美好；春草长于冬天的深；说着的话纷纷枯萎。断裂和错位的意象组合是别具深意的审美程序，是呈现诗意的审美策略。

光线正好发现隐，镇定/从人群中抽离/一切逝去的，和正赶来的风/看清了呜咽的过程，经过身体/留下冷暖/还有什么比弯曲更值得眷恋/事物因阴影而美好/它真实，也属于自己/正如呈现，只是存在的一种方式/正如春草长于冬天的深/正如说着的话/纷纷枯萎——《隐》

常理本是由感性生命主体看清鸣咽，感受冷暖伤痛，但此处主体是隐逸的。是光线发现隐，将这一沉默的存在者敞开，他镇定，抽离喧嚣人群，让真相在无言中自行敞亮。发现真实的不是双眼和阐明真相的言语，而是无法驻足的风。据说这首诗创作的起因是一群诗人在为诗歌法则和向谁争论不休，其中一位沉默不语并用短信告知远方的杨林，他马上作《隐》传到争吵地，诗歌被沉默的诗人们朗诵，争吵平息，人群散去。这首诗的写作背景直接启发了结尾“正如说着的话/纷纷枯萎”的意涵：争论只会使事情纠缠不清，真相会被力图说明真相的解释遮蔽，陷入混乱无序；而主体隐逸，悬置主观意见，才能回到事物本身。这充分体现了生活表象与内质、初衷和结局无法达成一致断裂。

诗之美在于丰盈和充满弹性的想象空间。《隐》于断裂处生成了丰富的诗意，使阅读向不同审美层面弥散延伸。《隐》除了初始信息之外至少还隐藏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指向被压抑的隐情之光。有一种感情默默无言，甚至被光线发现一些端倪，也会镇定自若，隐入无形。惟有抽离人群面对自我，面对所有如逝去之风过往和终将植入未来的记忆时，人才认清内心的呜咽，感受真切冷暖和疼痛。或许这隐情才是最真的情感，即便不被世人和规范认可，必须生世世隐藏在道德之光制度之光的面，不能表达不能倾诉甚至必须要在寒冬的冰冷中贮存，但也会因“属于自己”，是鲜活生命的构成而比伪装更值得留恋。这样的诗句，将文化面纱背后人性的力量抖出，让伤痛、无奈却温暖的光芒照亮生命。

心灵极地 岁月边城

——读夏天敏长篇小说《极地边城》

□纳张元

夏天敏长篇小说《极地边城》以昭通解放前一段历史为故事背景，围绕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达官显宦之家的大小姐——云霓情感生活的波澜起伏和人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来展开故事情节，通过对“边城女神”云霓、“白衣天使”玛丽·朱丽叶、留法植物学专家胡镜远、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鸣皋、边城专员蒋百狗等人物不同命运和人生追求的描写，反映了昭通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

封闭式边城记忆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偏安一隅，绝大部分是山地高原，横断山脉切断了东西向的交通。云南人口多分布在山地间的坝区，以坝子为核心，以坝子边缘的山区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由于山岭阻隔，地形复杂，古代交通又非常不便，各个山地社区形成了内向的封闭性文化特性。夏天敏笔下的“边城”便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古城。然而，“封闭遥远”并不意味着无法言说。汉族主义的文化观念与边疆地区原住民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长期以来，所谓大汉族主义的文化观念一直占有着主导性的地位。受这样一种大汉族主流文化观念影响遮蔽的缘故，那些长期生活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的文化，实际上一直处于某种有意无意被漠视甚至被歧视的状态之中。夏天敏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叙述了一个遥远的几乎被遗忘的边城传说。在全球化文明备受质疑的时代，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夏天敏这个掘矿人展示了一个处于“极地”的“边城”的历史。

封闭而成的“闭合”式历史，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人性与命运的协奏曲

——评林那北长篇小说《剑问》

□林秀琴

《剑问》的阅读过程让人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快感，如果说《剑问》的确有几许武侠小说的风采与意境，也是源于它对传奇性的经营。《剑问》的传奇性主要源于对故事与结构的设计，《剑问》即问剑、求剑。一把传说中的春秋青铜剑，据说藏匿于状元巷29号的李家宅第，这个原本平静普通的家庭瞬间吸引了各种热切而隐秘的目光。小说中，这把春秋古剑一直是“缺席”的，却主宰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它成全了一桩门户悬殊、巨测多端的婚姻，将一个本分保守的家庭卷入历史的漩涡；它召唤离经叛年的李家兄弟奇迹相聚，兄弟三人不同的人生轨迹因为一把剑而重新交集……剑是故事的核心，却也是一个云遮雾罩的迷团。真的有这把剑吗？剑又在哪里？那些为剑而来的陌生面孔，背后又藏着哪些莫测的动机与可能的危险？不断延宕的悬念、明昧不定的枝节与人物幽隐复杂的动机，不时地营造追踪探秘的紧张与刺激之感，使阅读变成一场生机勃勃的智力游戏。剑在风火墙？吴子琛悄然掘开状元巷29号厚实高耸的风火墙，传说就落空了；剑在石牌坊？李宗汉费尽口舌心机如愿以偿推倒了石牌坊，仍然没有剑；剑在左牌坊？李宗启在风雨连夜掘倒左牌坊，仅仅贡献了一本来历不明而又瞬间化为齑粉的古籍《剑问》。寻剑，却没有剑，那把光影熠熠的青铜古剑源起于传说，而又落于更大的虚空。作家对故事绵密曲折的设计带来了阅读中别样的快意与趣味，悬念的发展所制造出的紧张感并没有因为悬念的落空而终止，相反，如同一个高速运行的物体突然挣脱地心引力般的牵引并终于获得自由，但这种自由又重新制造了一种无所依傍的虚幻感觉，一种更深刻也更无所把握的紧张情绪悄然扩散，仿如余音绕梁。一个好的故事是没有结尾的，林那北出色的故事设计能力，加上从容稳健、张弛相间的叙事节奏，使《剑问》成为一出巧妙机警而又沉着大气的现代传奇。

在这场漫长、曲折、危机四伏的寻剑之旅中，李家兄弟无疑是小说最重要的主角。小说分为“风火墙”、“石牌坊”、“左牌坊”三部分，分别以李宗林、李宗汉、李宗启的视角进行叙述，一个老实本分留守祖上薄产，一个阔别故土26年漂泊零落在台湾岛，一个因缘际会成为闽西山林土匪领袖，小说对李家三兄弟不同的人生际遇与心理性格进行了细致的铺展。在《剑问》中，作家表现出了对人物性格差异的细腻把握，对人物命运轨迹的精心铺垫，李宗林勉力维持家业的辛苦与惶恐，李宗汉曲折狡猾的心机，李宗启压抑苦闷的内心与隐忍的温情，每一个人物的内心都是万千波澜、沟壑起伏，经过每一个细节严丝合缝地相互渲染，这些复杂抽象的人物心性便有了丰盈的质感。

《剑问》再一次说明，小人物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在不经意中卷入历史的涡轮，寻常百姓与历史的交汇碰撞也可能惊心动魄。《剑问》并没有呈现一段完整段落的历史，而只是提供了一段历史中的某些遥相呼应的碎片：涌上街头的爱国青年呼喊者抗议的口号，一份隐秘的《田中奏折》带来了躁动的不安与激愤，日本殖民主义者步步进逼的铁蹄一声声凌厉，闽西山林里此起彼伏的枪声暗示了复杂的战争形势……这些历史的碎片类似于皮影戏里的剪影，带来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意象化的效果。《剑问》存在着两个交叉的文本，普通市井百姓的生活传奇是显性的故事文本，而历史则构成了小说的隐藏背景。由于小说将历史以碎片化的方式嵌入市井百姓的生活传奇，从而使得两个文本层次有机地交叉糅合，而非疏离与对立。一般来说，历史叙事的笔触时常是凝重滞涩的，但《剑问》对历史的处理则是轻巧而又清晰的，历史在小说中成为一个灵动的元素，它还被还原为人物生活与经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那个凌驾于人物之上的“他者”，同时，通过丰富真实的文化细节与历史意象，来中和、稀释小说传奇性经营所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使得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成功跳脱了传奇叙事的陷阱，使得小说有了文化叙事的肌理与历史叙事的视野。

《剑问》意味着林那北小说创作中正在到来的成熟状态：故事营造的娴熟自如，以及从容的叙事节奏，还有因此更加沉稳的小说风格，而不仅仅是锋芒。好的故事设计与人物塑造乃至个人风格的形成，这些标尺时常用来检验一个小说家创作的成熟与否，但是，技艺上的成熟也容易伤害文学创作最原始的创造力，即对历史、生活、命运境遇的概括与书写——博尔赫斯在谈到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时指出，对塞万提斯技巧或风格的指责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堂·吉珂德》的重要价值在于塞万提斯在其中所表现的命运感。让我们欣喜的是，林那北的小说创作并没有掉入技巧的陷阱，虽然她的技巧随着经验的累积与勤奋的探索已经日臻成熟，这已经充分地体现在《剑问》中，但《剑问》的最大魅力仍在于它所呈现的对命运感的观察：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何与历史不经意地碰撞，各种偶然性的机缘如何左右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穿透时间与历史，从而洞察命运的奥秘，林那北在这个纵深上的系列探索《寻找妻子古菜花》等早期作品就已经开始了，《剑问》是这趟旅程中一个漂亮的阶段报告。我们相信，有这样一个良好扎实的基础，随着作家对历史与现实这条时光隧道的不断掘进，对历史经验与生命体验的不断深入，林那北的小说创作将会超越故事而创造一个更高的哲学层次。